

审美革命与工商文化的精神造型

——海派散文的文学文化史意义

陈啸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 湖北武汉 430074;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4)

【摘要】海派散文是近现代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市民散文,其突出的特点是发现日常生活本身的美、幸福与乐趣,不求“载道”或本质,是传统文学中居于主流之外市井生活的发展与扩张。海派散文的发生与近现代上海的都市化进程相始终,本质上属于工商文化的精神造型。在一定的意义上,海派散文正体现了工商都会的主体意识,其所表达的是置身于现代工商社会中普通市民的人生感受与普遍心态,是近现代上海都市文化因内而外的主体性表现。海派散文作为近现代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市民散文或生活散文也同时标识着近现代中国工商化的进程。

【关键词】审美革命;海派散文;海派文化;文学审美性;文化本体性

以郑逸梅、范烟桥、周瘦鹃、胡寄尘、严独鹤、姚民哀、张慧剑、叶灵凤、章克标、倪貽德、章衣萍、林徽音、钱歌川、马国亮、梁得所、潘序祖、徐訏、张若谷、汤增敢、苏青、张爱玲、无名氏、丁谛等为代表的,集中于近现代上海的,以同情、欣赏的眼光将都市生活与都市情感作为中心表现的海派散文,是近现代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市民散文。其突出的特点是发现日常生活本身的美、幸福与乐趣,不求“载道”或本质,是传统文学中居于主流之外市井生活的发展与扩张。海派散文的发生与近现代上海的都市化进程相始终,本质上属于工商文化的精神造型。在一定的意义上,海派散文正体现了工商都会的主体意识,与工商文化互为表里。其所宣叙的是置身于现代工商社会中的普通市民的人生感受与普遍心态,是近现代上海都市文化因内而符外的主体性表现。海派散文作为近现代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市民散文或生活散文也同时标识着近现代中国工商化的进程。

一、工商化进程与沪上散文的分形

海派散文从来不是近现代上海散文的唯一形态,其生成与发展的过程始终伴随着“鲁迅风”杂文、现代性灵小品等其他形式的散文品类,且常常有着交互的影响。而近现代上海散文的复杂多元生态正是决定于海派文化的混合及移植型态。海派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工商性与地方性。海派文化的工商性规约了上海人趋新尚新与西方都市化的洋气。海派文化的地方性主要体现于江南吴越文化,典型的是两浙文化的神秘性,基本有二:“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点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点的洞彻与措词的犀利。”如果说,海派散文对应着都市文化的工商性,则“现代性灵小品”与“战斗”的“杂文”则对接着两浙文化的两种潮流。不过,都市工商性

的发生与发展固然规约了海派散文的发生，也天然提供了性灵小品存适于此的可能性。工商文化追求的是开新蜕旧，交流融通，是传统乡土中 | 司中的异流，本身即包含着民主与个性解放的 W 子。现代性灵小品所推崇的晚明性灵文学即是在士商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名士自有的文化意识与生活风尚也只有 在 相 较 宽 松 的 工 商 化 的 环 境 中 方 能 更 好 的 存 适 ， 因 为 其 狂 放 不 羁 、 自 由 洒 脱 的 个 性 形 态 与 乡 土 中 国 的 政 治 性 是 对 立 的 。

海派散文分为新旧两个阶段。旧派市民散文（主要指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散文创作）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但已经属于商业文化的产物，其显在的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正体现着市民的生命力。新派市民散文即现代市民散文是现代都会的产物，是 1920—1940 年代中_现代都会的生命意象。现代市民散文的取材极为广泛，是与现代市民生活的无缝接轨，其提供给读者的不仅仅是文学趣味，更是一种生活实感。现代性灵小品也写生活的日常性，但较之现代市民散文终究显得渊雅，距离生活与大众比之市民散文毕竟远了一层。现代市民散文的写作门槛很低，有专门的散文小品作家，更多的则是一些文学修养丰富的非文学家，是一种大众化、平民化的散文写作。现代市民散文是现代都会真正的产儿与自主的发声，更多来自都会生活的刺激。但周作人、林语堂等的现代性灵小品却深远影响了现代市民散文的品格。有着相当京派背景的林语堂所办刊物的“宽容”客观上成为现代市民文人集聚的场域，提供了现代市民散文产生的平台。周作人等京派作家在林氏刊物上的集体展现，也很难不对现代市民作家产生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影响。作为编辑家与散文理论家的林语堂在论语派刊物上的凸显，也在时时昭示出一种报刊文体的写作范型，会潜在规约着市民散文的文体选择。概言之，周作人、林语堂等的现代性灵小品提升与雅化了市民散文的市井气，延续与发展了“五四”以来京派作家对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发现，使其更能以花样翻新及相对高雅的品格深得文化市场的接纳。

“鲁迅风”杂文在显在的层面上对举于现代性灵小品及市民散文。鲁迅从不讳言上海的烦扰势利与险恶，他更喜欢北京的沉静。鲁迅看中上海的也许只是租界环境的安全、包容与发挥战斗的自由。他在《小品文的危机》里就明确批评林语堂提倡的幽默与闲适实在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在风沙扑面，炸弹满河的情势下，“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平滑”。而在《从讽刺到幽默》一文则又强调：“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 n 闷气，要借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但其中单单是为笑笑而笑的自然不少。”在鲁迅看来，性灵小品的“幽默”易于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为笑笑而笑笑”的“滑稽”无聊小品。并且指出“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一文里，则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批判“没海者”文人的近商性，指出其不过是“商的帮忙而已。”“鲁迅风”杂文的重要作者唐钺在《游戏文章》里亦嘲讽林语堂倡导“性灵”是“从古墓里腐烂的尸骨上，刮下一些碎屑，当作药末，来医时行症。”其实，林语堂提倡“幽默”的初衷是说真话，力避滑稽与刺激，追求一种有所寄托的纯正的幽默。但现实中，理论的影响与创作的实际并不一致，在后起年轻一代上海文人那里常常出现幽默的变味，流于游戏与滑稽，甚至如章克标等以极度“轻浮的态度”表达 A 己“极

端”的个性。这种“极端”性灵表现的“幽默”在一定程度上又有着消解“个性”的趋势，即现代文明下的“热情”的衰退。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消解，而是文明发展到一定层次上所呈现出的格式化的惰性。诚如陈淑华所说：“文明愈进，人便一天一天愈近于‘机器人’，在一定的時候办公，归纳人几条一定的定律的封套以内，万不许有热情存在。于是性灵再也抬不起头来了。当然，这也正是性灵小品与现代市民散文的区别点之一。鲁迅在批判性灵小品与市民散文的同时，也有对其宽容与肯定的一面。工商文明本身就规约着个性的张扬与性灵的解脱。鲁迅的杂文无疑也是一种性灵杂文（但是一种社会性的性灵言说）。鲁迅始终认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厉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即便是“遵命的文学也必须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鲁迅所反对的是“虽说抒写性灵，其实后来落了窠臼，不过是‘赋得性灵’，照例写出那么一套来”。影响“鲁迅风”作者的多是社会严峻的现实而不是上海的工商环境。然而，“鲁迅风”杂文的存在对上海的幽默性灵小品与现代市民散文却也有着纠偏的意义。它在时刻提醒着性灵小品与市民散文不要往着“油滑”方面的发展并得以保持风格的新变。

乡土中国土壤上产生的现代都会毕竟不同于两方，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形成的现代都会工商文明，处在中国广远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而且，上海本身就是一个华界、租界、华洋过渡界杂存之地。乡土文化是一种政治型的文化，政治文化强调一种统一、严肃以及激烈、批判、战斗等，追求宏旨大意，带有一定的“贵族气”。工商文化追求的是个性、自由与宽容，并因之带着轻趣、世俗与洒脱。整体言之，性灵小品与“鲁迅风”杂文较之市民散文，有着较多的乡土文明的精神面影与中华传统文明的独立品质。而市民散文更多地直抵都会工商文化的内核与新的精神的“原乡”，在城市与乡土经验的激荡中，“西风”压倒了“东风”。但以上海为代表的近现代中国都会源于西方的殖民化而被动兴起，有着原初的创伤经验，市民散文又更多地表现出对两方“物质现代性”的崇仰与机械性的审美及先天的颓废。在不统一、不彻底的近现代都会文化环境下，由于作者各自文化的偏重，出现了散文审美区域的分裂与抒情主体视角的离散，进而保持了多元散文的相对独立。

生存于海派文化场域中的都会文人在“工商性”与“地方性”的共同作用下，时或有着文化心理的“双柄”或“多柄”的复杂形态，也由此决定了其散文创作界限的模糊，各类散文之间的游移或越界创作时有发生，显示出分裂而模糊的文化时间意识与城乡镜像的暧昧与混杂。比如：林语堂的性灵小品尤其是1930年代前期的小品文字是时涉政治与时事的，似杂文的笔法，而一些篇目如《梳、篦、剃、剥及其他》《悼张宗昌》《奉皆不哭不笑》《上海之歌》等本身就是杂文。他的《梳、篦、剃、剥及其他》即以四川童谣“匪是梳子梳，兵是篦子篦，军阀就如剃刀剃，官府抽筋又剥皮”讽刺了“匪不如兵，兵不如将，而将又不如官”的政治现实。林语堂发表于《论语》第一期的《悼张宗昌》句句反语，惋惜张氏的被刺，赞颂他的“刚勇”、“直爽”、“良心”及忠孝，但这恰恰是在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在《奉皆不哭不笑》一文所指出的“九·一八”严禁游行与“双十”停止国庆的两大政策实在是让国人哭不得也笑不得的政策，讽刺了国民党当局党治与训政的专制性。而他的《上海之歌》名为歌颂，但分明是

对上海工商文明的揶揄。请看他的叙说：神秘而伟大的上海，是铜臭的大城，“搂的肉与舞的肉的大城吃的肉与睡的肉的大城”，“行尸走肉的大城”，……“你这中国最安全的乐土”，“我歌颂你的浮华、愚陋、凡俗与平凡。”性灵小品在当时越来越严肃的上海的存适环境是艰难的，与官方当局与左翼文学都是对立的。如当年《语丝》文体里的“任意”，性灵小品的滑稽里有的是“正经”与“严肃”。在对待官方与正统的态度上，性灵小品与“鲁迅风”杂文确又属于同一战壕。

市民文人同样有着对工商文化与都会现象透视及批判色彩的市民化杂文，旧派市民文人的鹭翥散文一开始就有着浓重的杂文气息，其揭露抨击黑暗现实，痛斥二十一条，讽刺封建军阀政客及世风等横眉怒目式的笔墨在诙谐的主调中时现丰姿，杂文笔法在现代市民散文里依然故我。如：杨剑花的《上海之夜》说上海的白天浸在煤烟灰尘之中，而夜的上海却是“歌舞声平”，“在夜的上海人，个个是漂亮，是阔绰，是享乐。除掉盯着行人，一味恭维的小瘪三是例外。”在夜的上海，“寻欢作乐的去处，是多得不可胜数”，“只要有钱，只要肯花，什么都有，真是‘万物皆备于我！’”邵洵美在《感伤的旅行》中强调自己与上海的血肉关系，但也深感对上海的厌倦。上海有他的家与新居，是一部自己的历史。然而，“在上海路上走，我会有一万个念头，每一个念头是一个埋怨。”因为“常住上海，头脑会变成很简单”，“从窗口看出去，一片片红瓦该藏着许多复杂的故事。用不到你管；你要，自己家里也有。曾经想要探听每一个人家里的秘密，合起来一定是部不朽的作品；但是他们的情节类同，会叫我奇怪上帝的创造，也不过是自己在重复地模仿着自己。”复制化的现代上海啊！叶灵凤的《煤烟》主要思考与批判了近现代物质文明给上海带来的污染。现在的江南，尤其是上海，如林的烟閤冒出来的煤烟，混沌腐臭了的上海的河流，已经摇撼了“江南明媚静谧空气中的诗意”。另外，市民文人王仲鄂的《病中杂记》，徐光燊署名“坦克”的《夜归》，徐翎的《生之寂寞》，鲍莘锄《漫谈卖淫》等，则是对都市平民及知识者生活的寂寞与忧郁，生存的艰难，生涯的寂寥等都会负面现象的关注与透析，虽无批判的锋芒，但亦显示出“左倾”文学的色彩。其实，近现代中国土壤里产生的工商文化，是乡土中国占据主流的国家政治文化之外的一种自足自律的非正式的边缘文化，对封建性的政治文化具有一种天然的对抗性与否定性，故而，工商文化规约下的市民散文先天就有着杂文式的批判性。封建性的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的积习，长期伴随着现代中_都市化的进程中，使得中_都市文明变得复杂，也由此决定着市民散文对都市文明本身的反思。

不过，同样是杂文性的批判，但三者的基本态度与笔法却也判然有别。“鲁迅风”杂文是近于直面严肃的批判（当然也有曲笔），而性灵小品是詹詹小言寓含宏旨。“鲁迅风”杂文与现代性灵小品似乎是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与发展着“五四”时期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判及西方的自由民主，只是现代性灵小品少了些许严肃，没有“鲁迅风”杂文对政治及官样文章对立的尖锐与激烈，也不再以文化英雄的面貌出现，有着“拟”市民化的意味。但性灵小品文人又不是泯然与俯就于市民中的普通人与市民大众的写作，而是以隐身的方式拟市民大众的口吻看取社会的真实，幽默的外壳似乎成为现代性灵小品批判现实的方略，在对既有传统与权威反抗性这一点上，现代性灵小品与“鲁迅风”杂文恰似“软”“硬”两面的互相补充。市民文人杂文虽

有杂文文体间有的“泼辣”与“尖锐”，但较之“鲁迅风”杂文，往往是温婉含蓄的旁敲侧击，也不似性灵文人杂文隐秘的“崇高”，更多的还是以平等的腔调、平视的视角追求着市民化的诙谐。

海派文化当中居于主导性的工商文化规约与呼应了市民散文与性灵小品，也同样影响着战斗性的杂文。得迅的“花边文学”与“准风月谈”即是以闲适幽默甚或商业化的外衣包裹着内在的“风云”。鲁迅1930年代经常发表作品的《申报，自由谈》也一直强调趣味与消遣性的办刊思路与编辑方针。《自由谈》的版面就设有“游戏文章”、“海外奇谈”、“岂有此理”、“博君一粲”等栏目。本为“鲁迅风”的一些人，如文载道、柯灵、周楞伽等，也时或有着市民化的笔墨，缺少匕首投枪似的讽刺锋芒。写作性灵小品的周黎庵、谭正璧、金性尧等，也偶有市民意味较浓的散文创作，似以城市异质者的眼光在接近着都会的秘密，而且颇为真切。当然，由于乡土文化的滞重与积习，所谓市民散文的代表作家在以都会文化塑造下的审美眼光与心灵主体全面考虑都会人事物像时，也时以眼角的余光与心灵之一寓流连乡土。在共同的工商语境中，生活于都会中的文人似乎都失去或消解着传统文化的精英意识，或抒写遭遇都会时的情感与忧郁；或抒写自我被都会机械文明抛入疾驶轨道中的兴奋或不合；或抒写都会环境串，的无根与漂泊；或抒写都会文明病的愤懑，等等，与当时的革命主潮或传统文明，仿佛都有了隔膜，再现了稍神孤岛与时代夹缝中的精神状态。

然而，海派文化虽然混合有传统吴越诸文化的成分，但工商文化毕竟是其核心与主体。市民散文正体现了工商都会的主体意识，与工商文化互为表里。故而，在所有存于都会的散文形态中，最有资格代表海派文化的只能是市民散文。其所宣叙的是置身于现代T：商社会中的普通市民的人生感受与普遍心态，是现代上海文化因内而符外的主体性表现。它“弥补了”杂文“无我的不足”，亦“纠正了”性灵散文“唯我的狭隘”，拓宽与延展了闲适派散文的领域，接续与发展了“五四”时期开始的生活化散文的传统，自属于新鲜与未来。

二、“人”的回归与审美形态的革命

作为现代工商文化的产物，海派散文更多地执于形而下的物欲与官能的追求，有着平民化、平面化的审美意识。读海派散文，仿若感觉到一个琐屑但却真切的生活世界，它不是历史的，而是一种生活与现象的呈现，体现着市民清醒的现实主义。海派文人不太相信日常生活之外的历史，而是关注于俗世之中可触摸的真实存在，不求高深哲理，嗜谈俗事常情，显生活的本味与真实。方寸之中所遇、所感、所想，尽可以说理、叙事与抒情，以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有着浓厚的小市民情结及生存意识，杂遝、卑俗、热闹是其标签。海派散文的突出特点正是对多样日常生活（主要是都市日常）与现实的逼近以至融合，很多生活元素直接进入作品，而非表现或再现，是一种对“实”生活的审美。譬如：丰子恺笔下的众多有情世相或无情物象虽有自我的竹理与禅悟，但同样包含着对生活的浓厚情趣与日常人事的热爱，他宽容地审视着都市与乡村的一切。“柴米”、“油盐”、“肥皂”与“太阳”等恰恰是张爱玲沉醉于此并努力从中发现一个安静的所在，其散文的日常抒写正似一种感性的生活流，几多苍凉，几多虚无，几

多无奈，且又几多温热。章克标的散文则以平视的眼光看取俗世的一切，以轻松漫聊的方式肆意臧否身边随遇的一切，在近于“油滑”与插科打诨式的腔调里消遣与消解着现实人生的一切。钱歌川的散文落点小，是“竹头”“木屑”，但挖掘深，优雅地看取日常生活的真相，他用轻松与沉重解读着生活的沉重与紧张。街头巷尾的情调，茶楼酒肆的意兴是予且散文运思的基点，予且散文所惯常表现的正是市民百态及普通都市人与物的关系，从习焉不察的生活“琐屑”上，寻觅生活的意义与人生的深度，他是都市生活的体验者，也是都市的精灵。梁得所的散文写上海都会生活的复杂声浪，撼动的空气，黄埔滩的别离与欢愉，南京路的繁华，北四川路的夜生活，等等，虽杂有东方精神主义者的心里冲击与个人主义的享乐意味，但究竟彰显着郁勃的生命力。张若谷的散文是“灵”与“肉”的饮食，感觉的盛宴，他是都会的礼赞者。

整体而言，海派文人身体力行感性融入的日常生活，是应景的、情绪的，却是真实的，体现了海派文人对传统知识分子“教化”或“教育”等精英意识心态的远离及其对居于下位的市井小民情绪的靠近。在“实”生活的层面上，反映出都市的都市面相及主体心灵的都市性，而且，海派散文作家庞大的阵容与成分的复杂决定了海派散文日常生活样式与人格模式及都市情感的差异与多元。但在现代都市工商语境的共同规约下，差异与多元之中又有着共通性。整体而言，它俯下身子，排斥传统理性与本质，模糊现实与审美的界限，是市民话语的奇丽景观。传统超越性的官方或精英意识开始倾向于大众性的感性娱乐，理性规约让位于鲜活的生活，海派散文给予读者的是一种开放的现实与感性的自明，诚然，日常生活一直存在，但作为一种观念与审美，却是现代的产物。由古及今，曾有过“性生活”与“低贱生活”、“神圣生活”与“世俗生活”、“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等的区分。日常生活包容广阔，难以定义，几乎所有鸡零狗碎的东西都可以归入其中。尽管如此，它还是有其最基本的特性。西方的费瑟斯通曾尽力为其概括出了五个特征：“重复与习以为常、再生产与生计维持、非反思的当下性、共在的快乐体验，以及差异性。”近现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上海工商业的高度发展决定了上海已然进入消费性的现代市民社会，改变着海派文人的价值观、人生观、职业观、审美观等，是一种由内到外的深切改变，规约着他们从轻就俗，走向市民，走向大众，走向日常，也就进而决定了海派散文对都会空间中的偶然、短暂、转瞬即逝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关照。一般来说，文学是一个特定的社会时代的产物，它的是与否均裁决于当时的文化。文学本身是一个历史与文化的建构，以诗意的眼光审视凡俗琐碎的日常生活，意味着一种审美形态的革命，反映了文学与文学本质的改变，也意味着社会与文化的变化。海派散文已经不同于对自然、宇宙、山林、田园等的传统乡土中国式的审美，也不同于“五四”一代精英知识分子对日常俗世生活的居高临下，自属于别一世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海派散文的日常抒写不仅仅规约于都市文化背景，还有着诸多现实的因素。如：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同中国的其他很多地方一样，处于国民政府与日伪政府腐败混乱的统治之下，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由紧张的时局带来麻木的精神，更进一步使得包括散文在内的都市文学整体倾向于都市人个体的生存及烟火俗世。

海派散文作家群是在二十世纪30年代“形形色色，新的旧的，右的左的，中的西的，都在各显神通”的文化气氛中崭露头角的。海派散文的日常言说，没有左翼杂文的战斗性，与林

语堂、周作人式的闲雅、清谈、自我等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它是一种平等的融入，把生命的意义寄托于生活。其对“日常生活”的抒写不是“载道”，而是发现生活本身的美、幸福与乐趣，是传统文学中居于主流之外市井生活的发展与扩张。海派小说中当然也有日常性抒写，典型的比如予且与张爱玲，较之海派小说，海派散文更为直接地呈现出海派文人的真性情。它让我们真切地感觉到作家本人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回归与肯定，是生活中的人，更是现实中的人。对日常生活的亲近，其实质即是向现实中“人”的回归。传统文化是无我的，重群体不重个体。而人是生活于具体生活中的个体，现实中的人很难做到纯粹，肯定日常生活的合理性，也就是在肯定人的合理性与个性。生活的现实虽然琐碎无奇，但是有铁硬的事实与根基，在形而下中自有“道”。海派散文清晰地再现了海派文人现代性的“人格”及思想文化的新气象。海派散文所展示的都市生活样式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对现代中国都市性与都市文化的创造，也同时凝缩与映现了行进中的现代中国都市人心灵的历史。

表现生活本身的“美”是海派文人本能地呈现，也是一种有意识地追求。在都市生活与消费文化的刺激下，海派文人对于世俗人生的表现是自然的而非做作的，往往有着切实的现实生活场景，为人姿态平和，市民腔，平民状，没有架子，因为作者本身已是市民中的一员。但另一方面，当市民文人有着生存的考量，进而想到作品的效应时，其从低就俗，偏爱一般，力主安稳，亲近大众等文体品格即显示出了有意识地一面，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流布与发展之下，市民大众的文学消费趣味必须给予考虑与重视。然而，在“迎合”与“适应”市民文学消费趣味的同时，海派散文还必然有着“尖新”的一面。追新与善变是现代都市人克服被弃焦虑的一种方式，作为市民文人，既要“为读者写好看的文章”，同时还要给予他们一点“别”的东西。“迎合”当中还有“引领”，海派散文“引领”的一面常常表现为大胆直言，多发奇论，有着“现代人奇异的智慧”。这种“通俗”与“尖新”并存一体的海派散文规约于消费与资本的逻辑，也自然带有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与对都市文化的反思意味。

海派散文的这种“实”生活的审美，似在揭示一个“此刻的世界”。它没有历史感，所有的一切都处于一个平面的现实世界。“往昔”与“未来”仿佛已无意义，唯有“当下”方为“根本”，执着于存在的本原，意味着浮世的悲欢。

三、近现代中国工商文化的精神标识

正是因为工商文化的主导，海派散文实现了从传统乡土散文到都会散文的转型。在中国传统的奴隶与封建制时代，当然也存在着附属于农耕经济的商品交换与消费形式，但在以乡土文明主导一切的时代，其中的消费文化与商业形式总有着浓重的乡土中国的意味，是一种农商的形式与性质。在近现代以来特别是1930—1940年代的上海，作为乡土文明价值核心的诸如忠孝、信义、廉耻等，已然失去了故有的光芒。文学文体的变化也正意味着文化人人生价值观念的变迁，趋向一种奢华、好动、重利、求乐、寻变、尚俗的转变。或者说，海派散文与工商文化有着通约与趋同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近现代中国工商文化的标识。

散文作为一种文体与文化之间，自古有着较之其他文类更为直接密切的关系。在中国，这种密切的关系不仅体现在散文的实用因子与中国尚实用理性的契合，还体现在两者于人的情感与心灵的共质。从文化竹学的角度来说，散文是人的精神造物，而人又是文化的动物。“人的身上如果没有文化或者说人失去了创造文化的能力，人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散文的文化本体性与文学的审美性是一种知性与感性的交融，理性与诗性的结合。海派散文正体现了市民文人基于吴越文化基底上的都市文化的认同，并因之形成价值观与荣誉感，以同情与欣赏的态度感觉它、描述它以至建构它。其审美自觉性主要通过如下方面得以实现：

一是文化趣味。海派散文的整体特点是自然朴实中的蕴籍圆融、浅近通俗，表现出市民日常俗世的喜怒哀乐与真实的情态。其所追求的是一种世俗化与商业化的轻文学性的散文文体。海派散文没有京派散文、“鲁迅风”杂文等的理想化姿态与俯瞰世间苍生的精英色彩，而是力求与广大都会市民文化趣味的融通，潜入都市日常生活的深处，以自我经验的方式关怀生活的真实与常识，从日常生活最琐屑的基底出发，发现与如实地描绘庸常生活本身的乐趣与力量，表现出浓郁的市民意识、世俗意识、市井意识，追求散逸、精巧的享用性，力求使人感到愉快，引起兴趣，显示出市民文人本身的浮华、精明，实惠。它远离时代历史，漠然于国家民族相关的历史事件，充分体现出市民散文的商业消费性。

二是文化气质。散文文体的文化本体性决定了其与主体人格的同构。海派散文M示出了市民文人相对稳定的生活化的，无序而自然的个性特点与风格气度，不求深刻与庄严，自由散漫，甚至“粗鄙”，带有些许的市井气。当然，作为中国最早发展起来的现代都市，又决定了海派散文及海派文人的现代质。

三是修辞的经营。为了达到散文文体的商品化与流行性，市民文人在行文风格、叙述腔调、描写手段等方面，皆显现着一种都市人的精神品性。海派文人以庸常生活与俗人的意识放逐雅正与庄严，追尚幽默与轻松。他们排斥说教，自然本色，凡人凡语，甚至发奇论，造噱头，以通俗化、世俗化以至低俗化的描写超越与消解着一切，体现出一种商业化的审美情趣，也契合海派文人自我及全体现代都市人彷徨无据及颓废的心理状态。海派散文的商业化与世俗性，也正是海派散文的现代性。它反叛传统，强调竞争、松散、欲望、装饰与实利等，凸显着“现代”的“市”以及现代人的压抑意识与疯狂意识。当然，作为进行中的现代中国都市文化，海派散文也似乎始终隐现着乡土文化的印记与原初的创伤经验，体现出中国式现代都市文化的品格。

海派散文是属于城市的，本质是属于生活的，是散文的生活化。散文对身边琐事的日常性抒写，在“五四”时期曾为一时之尚。其根源则是“五四”时期对人的存在价值的发现，影响了“五四”散文对人生世俗的体察与描写。1920年代末，社会矛盾急剧动荡，加之作家思想的转变，规约了散文小品的题材走向，“身边琐事”似乎变得无谓，生活化的散文失去了往日的风光。恰在此时，海派散文却接续和发展了生活化散文的传统。在复杂的言说语境与都市环境的刺激下，海派文人几乎完全由社会归向个人，远离了传统的“神圣性”，加重加浓了散文

小品的消遣性、世俗性及人生风味的吟颂。点点滴滴，似乎都在彰显着工商经济漩流中的市民心态。“日日紧张的生存条件和善于精打细算，养成了沪上民众普遍关注努力和积累，对实惠的追求和对自身精力的宝爱往往使他们不太计较品位格调，唯痛快、新奇、有趣是上。这类十字街头的审美趣味大不同于象牙塔的审美趣味，失去了严肃却获得了通俗。正是这种通俗化，连同现代化，使海派散文小品在满足读者消费的同时，也刺激了作家的生产。”当然，对商品经济的适应及其对政治的远离在刺激着市民散文发达的同时，也导致市民散文带着负面的因素。畸形的都市生活及其规约下的城市文化也有着不健康的東西，势必会影响着海派散文的品格。海派散文唯求个人委曲求生、苟且偷生、现世安稳的心态与生存之道一定程度上是以放弃对人性与文学之尊严作为代价的，势必降低“五四”以来所开辟的“人的文学”的底线。海派散文中也时有着市侩气等恶俗性的一面，亦有着对趣味享乐等的欣赏、追尚以至对现实的规避等，但不管怎么说，海派散文的生活化与城市性是乡土中国土壤上的新现象，意味着新鲜与未来，有着无比鲜活的生命力。海派散文呈现了乡土中国早期城市化的生活与精神的面影，对于今天的文学与文化，必定有着一定的借鉴与启不意义。